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7621(2012)01-0099-08

中国现代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篇章 ——正确评价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成就

□陈其泰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5)

摘要:认真辨析和总结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成就,不仅关系到正确认识中国现代史学发展的道路,澄清人们存在的严重误解,而且关系到认清当前史学发展的方向。本文试从通史、断代史、专史研究的成就,对重大历史问题认识的推进,整理出版大型历史文献的巨大成绩,学科建设取得的显著进展等四个方面进行初步的总结。

关键词: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成就;唯物史观指导;实事求是优良学风;中国现代史学发展道路

一、正确评价“十七年”史学的意义何在

按通常理,这个问题应该不难作出判断,因为,建国后十七年,从全国范围内来说,尽管前进的道路经历了曲折,1957年以后产生了“左”的错误,但国家建设的成就是主要的,缺点和错误只能居于第二位;那么,作为全国范围工作全局的一部分,对于历史学领域的估价,也应当作如是观。但实际上,人们的认识却大为歧异。有的研究者认为建国后十七年史学界教条主义盛行,整个中国史变成一部农民战争史,将十七年史学贬低为“完全政治化”的史学,完全依附于政治,毫无学术性可言,甚至将“十七年”与“文革”十年划为一个阶段,认为:建国后五十年的史学应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三十年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基本上是‘泛政治化史学’时期,以农民战争史研究为代表的研究体系使中国史学完全政治化”^①。而近些年来关于学术史的总结也缺少应有的一个环节,即把建国后十七年学术工作的成绩与问题作正确的区分,在严肃批评错误一面的同时,对于在唯物史观优良学风指导下所取得的成绩,实事求是地作出肯定。再向前追溯,粉碎“四人帮”、我国历史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以后,当时主要任务是拨乱反正,因此集中力量对于曾经一度肆虐的教条主义种种恶劣表现和危害进行揭露、清算,而未能顾及到讲正确的方面。结果便造成当前有不少的研究生和本科生对于四五十年前的史学界情形几乎毫无了

解,其思想认识受到上述观点的影响,因而存在误区,于是闭眼一想:“十七年”,教条化盛行,史学界并无成绩可言!

总之,对于建国后“十七年”史学正确地作出基本估价,是认为成绩是主要的,还是认为它一无是处,实际上关系到肯定建国以后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史学研究,是有利于史学的发展,还是认为它阻碍了学术的发展?“十七年”中出现的教条主义一度严重泛滥,究竟是因提倡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造成的,还是由于其他原因?认真辨析这些问题,不仅关系到正确认识新中国成立后史学发展的道路,澄清人们存在的严重误解,而且关系到认清当前史学发展的方向,因而具有不容忽视的理论意义。我的基本看法是,“十七年”中存在着两种学风的根本对立。一种是实事求是、坚持唯物史观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的优良学风,一种是教条式地随意套用的恶劣学风。“十七年”史学之所以成绩居于主要地位,恰恰是正直、严肃的学者大力发扬优良学风、坚持抵制教条主义恶劣学风而取得的。解决了坚持正确的方法论这一关键问题,才能对“十七年”史学道路作出正确评价。对于“十七年”中正直、诚实的学者所取得的成绩,我们不能采取无视的、任意贬低的态度。而应当肯定,“十七年史学”是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上述普遍重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形成了实事求是、健康向上学风的气氛下,经过广大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创造了可

收稿日期:2011-10-12

作者简介:陈其泰(1939-),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

观的成绩。然而,又因1957年以后出现“左”的干扰而产生了教条主义错误,在一段时间内严重泛滥,因此,在此“十七年”中国史学既有值得重视的成就,又有严重的教训。“十七年”中史学在曲折中发展,而总的来说成绩是主要的——这应当是我们客观考察之后得出的结论。围绕这一中心,应当对几个相关的重要问题作深入探讨,包括:史学界在实事求是学风指导下创造的业绩;建国初年学术界的风气及其变化;“五朵金花”讨论的反思;正直史家如何勇于抵制教条主义歪风等。本文限于篇幅,只能择要讨论建国后十七年史学家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取得的重要成就,其余问题容后另文论述。

二、通史、断代史和专史研究的成就

中国史学有重视通史撰著的优良传统,近现代史家对于通史研究和撰著尤为重视,这是因为通史要集中而贯通地讲述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要有把握全局的史识并能概括住各个历史阶段的特点,要对几千年历史中的重要事件、制度的演变和人物作出评价,最能体现研究者高度理论修养和掌握史料的功力,工程极为浩巨,同时对民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有巨大的教育作用。“十七年”中,通史研究的成果十分突出,有: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郭沫若主编《中国史稿》,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尚钺著《中国历史纲要》。范文澜的著作是在延安版《中国通史简编》的基础上精心修订完成的,内容自远古至五代十国,分为第一、二、三编(共四册,于1953年至1964年出版),总字数达110万字。范文澜对于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使之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有深刻的体会,一再告诫史学工作者要彻底摒弃把唯物史观当作现成公式去剪裁历史事实的极其恶劣的教条主义做法。他所论述的春秋战国时期是封建领主制向地主制过渡的时期,汉族在秦汉时代就基本上形成为民族了,中国封建社会经历了秦统一前的初期、秦到元末为中期(又以隋统一划分为中期的前段和后段)、明至鸦片战争以前为后期等,虽然并非全部作为定论,但是人们读后感觉到这确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分析中国历史的特点,而不是生吞活剥经典著作的词句,按照现成公式去图解中国历史。再者,全书内容丰富,认真发掘了经史子集中的材料并利

用一些考古史料,详细论述了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政治、经济、民族、文化、军事、外交等的发展过程,论述了历史上制度的沿革,评价、分析了众多的事件和人物。同时,全书在章节结构上组织严密、安排合理,文字精练生动,具有浓厚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这些更增添了对读者的吸引力。由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1962年至1966年,先后出版了第三、第四和第二册,包括三国两晋至近代部分。第一次的先秦部分,先由吴荣曾执笔,采用了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的观点,后来在有关同志建议下,为了有利于百家争鸣,主编翦伯赞决定采用自己素所主张的西周封建论,并自撰西周一章。先秦部分未及完成,他即含冤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由吴荣曾完成。至1979年全书四册一并印行。)这部书是1961年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选计划会议决定,委托翦伯赞主编作为高校中国通史教材之用。主要撰写人邓广铭、邵循正、汪篻、田余庆、许大龄等都是研究各个时期历史的专家。而且,在写作、讨论过程中,翦伯赞经常就体例、理论运用和史料鉴别等问题与编写组成员反复商讨,最后定稿时,他还要字斟句酌地进行推敲。这部通史经历了时间的考验,证明无愧为一部成功之作,并在中国史学史上又一次创造了集体著史、主编负责的成功经验。尤其作为大学通史教材,它具备着论述全面系统,内容繁简适当的独特优点。它文字简练,条理清楚,而又内涵丰富,对史实的分析中肯细致而又摒除空论,重要的基本史料都向读者提供而又绝不庞杂。该书在20世纪90年代荣获首届全国高校文科教材评奖一等奖,确实当之无愧。

断代史著作,可举出:尹达《中国新石器时代》(1955年初版,1963年再版改题《新石器时代》),杨宽《战国史》(1955年),何兹全《秦汉史略》(1955年),杨翼骧《秦汉史纲要》(1956年),王仲荦《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上册)(1961年),杨志玖《隋唐五代史纲要》(1955年),吴枫《隋唐五代史》(1958年),李光壁《明朝史略》(1957年),李洵《明清史》(1956年),谢国桢《南明史略》(1957年),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稿》^①(1951年),林增平《中国近代史》(上下册)(1958年),戴逸《中国近代史稿》(第一卷)(1958年),胡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初稿)》(1950年),何干之《中国现代革命史讲义(初稿)》(1954年),李新、彭明、孙思白、王真、蔡尚思、

^①太平天国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朝代,但因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有自己的年号、都城、官制、军队,与清朝相对峙,这里为了论述的方便,将《太平天国史稿》放在“断代史著作”一段中论述。

陈旭麓主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共4册,于1959年至1962年出齐)等。其中,《战国史》初版时,共20余万字,印行后在海内外受到欢迎。此后,作者对有关战国史问题继续作深入探讨,特别是对70年代考古发现的战国新史料,如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战国帛书、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等加以利用、研究,至1980年修订、扩充为第二版(约42万余字),至1998年增订为第三版(56万余字),成为内容更加丰富、影响更加广泛的断代史名著。《太平天国史稿》出版后很受欢迎,不到5个月即再版。罗尔纲在解放前就长期从事太平天国史的研究,至此书出版,又成为他研究工作的新起点。此后,他连续出版了30种有关太平天国史的著作,其中有《太平天国史论文集》共10集,有《辨伪集》、《订谬集》、《史事考》、《太平天国史丛考》等,又编成资料、文物汇集《太平天国印书》、《文书》、《文物》、《艺术》等集。在上述《太平天国史稿》和大量的史实、史料考证、辨伪的基础上,又经过五易其稿,至1986年,撰成150万字的《太平天国史》共4册。刘大年评价此书说:“它不止是在著者的研究工作中是带总结性的,在新中国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中,也可以认为是带点总结性的。”^[21]并称他是“新中国最早的太平天国史学一大家。”^[28]

在专史领域,可以举出:侯外庐主编,侯外庐、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等撰著的《中国思想通史》(五卷本,至1960年全部出齐),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研究》(上、下册,分别出版于1962年、1964年),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概要》(1955年),杨荣国《中国古代思想史》(1954年),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955年),韩国磐《北朝经济试探》(1958年)和《南朝经济试探》(1963年),漆侠《隋末农民起义》(1954年)和《王安石变法》(1959年),孔经纬《中国经济史略(明清至抗战前)》(1958年),傅衣凌《明代江南市民经济试探》(1957年),牟安世《洋务运动》(1956年)和《中法战争》(1955年),汤志钧《戊戌变法简史》(1960年),金家瑞《义和团运动》(1957年),吴玉章《辛亥革命》(1960年),陈旭麓《辛亥革命》(1955年),林增平《辛亥革命》(1962年),来新夏《北洋军阀史略》

(1957年),刘大年《美国侵华史》(1951年),丁名楠、张振鹑等《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一卷)(1958年),赵靖、易梦虹主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史》(上、中、下册,分别出版于1964年、1965年、1966年),胡滨《中国近代改良主义思想》(1964年)等。

侯外庐主编的《中国思想通史》共五卷,其中的一、二、三、五卷完成于40年代至新中国初年。^①从1957年至1960年,侯外庐又与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白寿彝、杨向奎、杨荣国、诸青等学者合作,经过6年的努力,撰成《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下册(上册论述隋唐至北宋时期思想;下册论述南宋至元、明时期思想),共96万字。第四卷撰著的条件比起解放前大为优越。首先是作者的阵营更加强大。“编写队伍的扩大,是建国以后马列主义学术思想史工作者进一步成长以及有机会会萃在一起的结果。而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及发展学术文化的政策进一步调动了大家的研究积极性,则是编写队伍所以能团聚扩大的决定因素。”其次是在图书资料上得到各方面的大力支持。北京各图书馆都提供了借阅善本书的方便,容肇祖先生慷慨借给罕见的明代抄本,安徽的同志热情借给方以智著作的抄稿。^[3296]该卷内容论述了唐、宋、元、明各大思潮和38位思想家,其中尤有特色的是:(1)论述了唯物思想家吕才、柳宗元、刘禹锡、王安石的思想。特别是柳宗元,“他在中国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发展史上,占据着重要的地位”。(2)从南宋起,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正宗思想,朱熹理学对思想界的统治达七百年之久。该书用力最勤的是方法论的探讨,指出他“是用思辨的魔术,先把自然秩序伦理化,然后再以神化了的自然秩序反过来证实现实社会秩序的合理性”。“朱熹的所谓‘格物致知’,并不是要人们去研究和发现客观事物的内在规律,而只不过是让人们去领悟决定等级品类的‘天命’。”(3)发掘了明代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方以智。由于得到许多单位(主要是安徽省)的大力支持,数年之内找到了包括《东西均》在内的方以智著作26种(其中抄本16种),在如此丰富翔实的史料基础上深入地进行研究分析。书中把他与近代西方哲学家狄德罗等人进行大量的比较研究,使人们知道他是一

^①侯外庐于1942年底撰成《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以后经过补充、修订,改称《中国思想通史》第一卷。至1944年底,又著成《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1947年以后,以侯外庐为主,并与赵纪彬、杜国庠、邱汉生等合作,于1949年著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第三卷,论述两汉及魏晋南北朝时期思想。解放前夕至新中国成立初年,侯外庐将《中国近世思想学说史》的第一、二编,即17世纪至19世纪中叶部分,补充修订,单独成书,定名为《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作为《中国思想通史》第五卷。加上此后完成的第四卷上、下册,全书共260万字。

位具有“百科全书”色彩的思想家,恢复了其在民族文化史上应有的地位。^{[3]12} 杨向奎《中国古代社会与古代思想研究》同样是一部重要成果,安作璋评价说:“这部书出版以后,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4]752} 上册“甲编中国古代社会”部分,主要探讨了古代土地制度和人身依附关系问题。“乙编 中国古代思想”部分,着重说明儒家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和地位。著者认为,在长期的中国封建社会内,儒家的发展可以分作三个段落:儒家、经学和理学。当然在理学出现后,即使在儒家范围内也还有反理学、汉学和清代的公羊学,但论其发生的作用,无论是积极的或消极的,还是应当以理学为重点。儒家(包含经学、理学)始终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它是为封建主义服务的思潮,始终为巩固封建社会秩序而起作用。当封建社会上升和发展时,例如宋以前,这种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当封建社会的发展越趋于停滞以至日益腐朽的阶段,则起的消极作用居多。本书下册重点研究了北宋以后中国社会历史上的几个问题。著者认为,唐宋之际,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有了新的变化。这时,客户由一个广泛的不著籍的阶层变作地主阶级的佃户,他们是有隶属关系的依附农民。北宋后的官户、形势户和一般大地主阶级则是穷凶极恶、无所不为,他们兼并大量土地而逃避徭役。这个时期农民起义的口号和前期相比也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标志着北宋进入中国封建社会的后期。这个时期的地主,可以分为皇室地主、贵族地主和一般地主。贵族地主一般是大土地的稳定所有者,往往世袭下来,土地越兼并越多,财产越积越大。即使随着旧王朝崩溃、新王朝的建立,他们仍然可以恢复发展,如曲阜孔家即为其典型。在中国封建社会后期,虽然出现了经营地主,集中了佃作力量,使农业达到了新的水平,但它还不能给宗法式的小农经济有力的冲击,没有给农业资本主义化创立更有力的条件。

[4]751-752,765

三、对重大历史问题认识的推进

——关于国家统一趋势不断加强的问题。

对此,范文澜在1953年所写的长篇论文《关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些问题》(即修订本《中国通史简编》一书《绪言》)中对此作出精辟的分析。他指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中国从此成为统一的封建国家。东汉末年由军阀混战而分为三国,唐时由藩镇之乱而扩大为五代十国,两次封建割据在前汉以后的整个历史过程中,可以说是短期的、变态的

(十六国割据,汉族地主不是主要发动者,北朝与金是外族侵入,当别论),而统一是长期的、正常的。为何中国历史上长期形成这种统一不断加强的趋势呢?“因为自秦汉起,汉族已经是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共同体,自北宋起,全国范围内政治联系性加强了,这个共同体也更趋于稳定。封建统治者因而有可能加强中央集权,压制地方割据势力,使之不能公然活动,政治上的统一又前进一步。秦汉以后的统一,都是‘在某种程度上仍然保留着封建割据状态’,不过程度上北宋前后确有些不同之处。”^[5] 因为汉族社会确实存在着一个相当稳定的人们共同体,所以统一力量与割据力量作斗争,总是统一力量取得胜利而告结束。即使在帝国主义侵入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利用暴力和阴谋企图分裂中国,但并不能真正达到它们的目的。这种现象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决不能以偶然的理由来作解释。而欧洲,在封建制度下是国家“分裂为多个独立的公国”,到了资本主义产生时代,某个民族历来彼此隔绝的各个部分才能够联结起来成为一个民族整体。因此,在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无论城市和乡村都出现了要求破坏封建割据状态的有利趋势,如同恩格斯在《论封建制度的解体及资产阶级的发展》中所描述的。而中国,则早在战国时就出现全国民众反对无休止的割据战争和要求统一的趋势,推动了秦汉时期全国实现统一。由此证明中国历史上统一不断加强的趋势,确有自己的发展道路,决不能拿欧洲的历史或经典著作的某一段话硬套,那样做必然探求不到历史的真相。

——关于历史人物评价问题。

历史人物评价问题十分复杂,其进行评价的标准需要通过认真讨论再从中作出正确的概括,而以正确的理论标准如何与历史实际结合起来作评价,情况又是千差万别。特别是进入新中国以后,新的社会制度刚刚建立,新的理论指导需要人们逐步熟悉,如何抛弃旧时代的错误观点,而确立起新的正确观点,殊非易事。有一个很典型的例证,50年代初,范文澜收到一封读者来信,信中说:三千年来的封建阶级没有一个好东西,历朝历代都是坏蛋坐江山。范文澜遂请他身边的助手漆侠写了《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一文,明确提出应以历史主义的态度,有分析地、恰当地肯定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杰出代表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6] “十七年”中关于历史人物评价的讨论曾有两次高潮。第一次是在50年代初,嵇文甫、翦伯赞、范文澜等学者都发表有相关文章。其中以嵇文甫的论述最有代表性,他提出历史人

物评价的“三个标准”：“第一，对于人民有贡献的，有利的；第二，在一定历史阶段起进步作用的；第三，可以表现我们民族高贵品质的。”^①第二次高潮是在1959年，因郭沫若发表《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及《替曹操翻案》^②两文引起的。曹操这个人物曾长期被视为“白脸奸臣”而遭受否定，郭沫若的文章却对其予以肯定，于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在全国学术界以至普通群众中引起重新评价曹操的热潮，仅4个月内就发表了百余篇文章。这次讨论，涉及范围甚广，不仅从各个方面重新探讨、评价了曹操及其所处的时代，而且引起了对历史人物评价的标准和其他历史人物评价的问题，是在十分热烈的百家争鸣中对新中国史学研究的一次积极推动。郭沫若在其上述两文中提出：“曹操对于民族的贡献是应予以高度评价的”，把曹操当作坏人“实在是历史上的一个歪曲”。评价历史人物，应从全面看问题，从大节上来权衡轻重，特别要看他对于当时的人民、对整个民族的发展、文化的发展有无贡献。翦伯赞也撰文指出：“在我看来，曹操不仅是三国豪族中的第一流的政治家、军事家和诗人，并且是中国封建统治阶级中有数的杰出人物。”“应该替曹操摘去奸臣的帽子，替曹操恢复名誉。”^③吴晗也撰写了《谈曹操》的文章积极参与讨论，他并于1962年写了《论历史人物评价》一文，总结了本人多年的研究，同时吸收了学术界讨论中的一些成果，论述全面且颇有理论深度。吴晗特别强调：评价历史人物，必须“放在他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同时代人比，和他的前辈比；而决不可以拿今时今地的条件和道德标准来衡量古人，因为假如这样做，就会把历史搞成漆黑一团，没有一个卓越的可以肯定的历史人物了”。他以秦始皇、汉武帝、曹操为例，论述评价任何人物，一定要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好的肯定，坏的否定。至于有功有过的，就要看他的功大还是过大，要严肃地加以分析。曹操“起兵镇压黄巾，杀过一些知名人士如孔融、杨修、华佗等人；军法残酷，围而后降者便屠城，这些都是坏事，不应该替他掩饰。但是他也做了更大的好事。他把长期战乱、民不聊生的北方统一了；建立了法制；减轻了人民负担，发展了生产；还提倡文学艺术；打败乌桓，保卫了边境的安全”。因此，应当如实地评价曹操是个功大于过的、应该肯定的历史人物。同时，吴晗还论述了评价历史人物的其他标准：“要从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出发，归结为阶级的行动”；“要从整个历史发展出发，从

几千年来多民族国家的具体事实出发”；“应从政治措施，政治作用出发，而不应该从私人生活方面出发”；“要注意阶级关系，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人物，但是不可以绝对化，把阶级成分作为评价历史人物的唯一尺度”；“决不可以拿今天的意识形态强加于古人”。^④显然，吴晗提出的评价标准，较之嵇文甫的论述是更为系统、深刻了。

——如何认识国家处于暂时分裂时期的历史特点。

自公元420年至589年，中国历史经历了南北朝时期约170年的分裂，以往论及这段历史，常常将之视为战争连年、社会动荡、生产破坏、民众痛苦不堪的“黑暗”时期，称之为“历史的大倒退”。究竟这段国家处于暂时分裂时期的历史是什么特点呢？尤其是从中国历史的全局来考察，有没有起到积极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更加认真、充分地发掘史料，更为深入地进行分析，又站在中国历史发展的全局来考察、评价其发展趋势，因而能够得出新的认识。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中，分别在第五章、第六章的结语中进行分析，他认为：“西晋末大乱，北方一部分士族和大量劳动民众迁移到长江流域，对南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起着促进的作用。”“东晋南朝立国将近三百年，除梁末大乱，其余战乱，都是局部的，短期的，破坏性并不太严重。大体上社会处在安定状态中，因此，经济和文化的发展，获得了必要的条件。”“长江流域经济就在这种情况下继续发展起来。特别是杂炼生铁的炼钢法被发现，使南方生产工具得到改进。水利的兴修，扩大了水田面积，耕作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稻谷产量比粟麦高，这就有可能繁殖长江流域的人口。东晋以后，人口有显著的增加，依靠劳动民众的力量，一向落后的经济，逐渐追上黄河流域的水平。黄河长江两大流域合起来，中国封建经济的势力更繁盛了。在这个基础上，才产生出比两汉更强大的唐朝。”^⑤他又分析北朝的历史趋势，认为：“魏太武帝消灭十六国割据的残余，统一了整个黄河流域，对中国历史作出了巨大的贡献。腐朽懦弱的南朝汉族政权，是不可能作出这个贡献的。”^⑥魏孝文帝实行均田制以后，北朝经济开始发展，文化也跟着发展起来。首先是佛教艺术，在大量人力物力的消耗下，表现得最为突出。其次是文学，以庾信为代表，综合南朝文学的精华，推动南北两朝文学达到最高峰。”^⑦范文澜又形象地比喻说，“自十六国至

①分别见《光明日报》1959年1月25日和1959年3月13日。

隋灭周,中原地区成为各族融化的大熔炉”^{[10]535};“融化是自然的趋势,融化也自然要伴随着各族间残酷的斗争,十六国南北朝战乱频繁是痛苦的,但又是不可避免的”。^{[10]540}

——如何评价清朝前期的历史地位。

这里,以刘大年于1961年发表的《论康熙》^[11]一文为代表。在此以前,对于康熙帝及清朝前期的历史地位并没有得到肯定,一些论著观点陈旧,把清政府的统治看做外国对中国的征服,认为清初的统治破坏了社会生产力,阻滞了社会经济的发展,甚至认为清前期对边境用兵、进行巩固统一的战争是残酷的征服,等等,总之,对康熙统治及清朝前期的历史地位采取否定态度,不承认其进步作用。《论康熙》一文把问题突出地提出来,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从政治决策、经济状况、民族关系、文化学术,以及对外关系等项,举出大量确凿史实并作深入分析,论证康熙是一代贤主,“在封建帝王里是一个杰出的、了不起的人物”,“对历史前进作了贡献”。重新评价康熙,不是孤立地评价一个封建帝王的问题,而是与重新评价清朝前期的历史地位直接相关。文章指出:“康熙在国内和对国外的斗争中都为中国历史留下了值得重视的篇页。在国内,康熙统治期间中国形成了一个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相当坚强统一的封建国家;封建的经济文化在这个条件下,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顶点。”^[11]“非常明显,康熙和清代前期的统治,使中国境内以汉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的团结在它的漫长过程里达到了一个新的境地”。^[11]“全国政治上的统一,人民生活的相对安定,为社会生产力恢复发展提供了条件。康熙后期到乾隆中叶,封建经济出现了繁荣景象。”^[11]康熙帝采取了废止“圈田令”以缓和土地集中的矛盾、兴修水利、奖励垦殖、蠲免赋税、节省开支、提倡节约等恢复社会经济的重要措施,收到了休养生息的明显成效,至康熙晚年,田亩增加了近143万顷,人丁增加了600万,国库充裕,物资比较丰富,这些都是农业、手工业发展的结果,表明社会经济的繁荣活跃。“对国外,康熙统治期间,中国以一个统一繁盛的国家屹立于亚洲东部,这使正在把触角伸向中国的西方早期殖民势力受到遏制,并且对亚洲邻近国家抵制西方侵略势力也有其影响。”^[11]而在此前,明政权统治衰败,无力抵御外患,早期殖民势力得以猖獗一时,在康熙统治下的中国扭转了那种不利的局面。总起来说,“在当时阶级斗争的推动下,康熙的统治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发展,他的进一步统一全国,抵制西方早期殖民势力的斗争,都是富有进步

意义的”^[11];“康熙统治时期和整个清代前期的历史车轮是向前进的,是应当充分肯定的”^[11]。很明显,在清朝前期,经济、文化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国内各民族间的联系得到加强,因而清朝前期是全国各民族统一国家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中国今日的辽阔版图也是在清朝前期奠定的。由于刘大年开创性的贡献,加上以后有更多的学者继续作探索,上述看法便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刘大年的文章并将康熙与俄国彼得大帝进行比较研究,指出两人在意志坚毅、发奋为雄、增强国力等方面很有相同之处,所不同的是,康熙始终没有使中国越过封建国家雷池一步,而彼得却以西欧国家为榜样大大发展资本主义,使俄国向近代国家推进,这则是由两人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决定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961年,对于当时在“左”倾思潮影响下一度盛行的“打倒帝王将相”的教条主义恶劣学风也是一种抵制和纠正。文中提出的观点很受研究者的重视,影响很大,如著名清史专家戴逸在1995年仍予以高度评价:“《论康熙》这篇文章,一直是我们研究清史的人经常阅读的。”^[12]

四、整理出版大型历史文献的巨大成绩

“十七年”中,因政治运动的影响以及对一些人物或问题进行过一些不适当的批判所带来的消极作用,史学界中一些人确实存在忽视史料的倾向,在一段时间内甚至极为严重,但决非整个史学界都是如此。事实上,中国史学会领导和许多有见识的专家极其重视扎实的史料工作,尤其在整理大型历史文献上做出巨大的成绩。“十七年”中进行了几项著名的、嘉惠士林之功甚伟的工程,主要有:①整理、标点《资治通鉴》;②标点、整理《二十四史》;③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④整理、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⑤有关《明清史料》、《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宋代、元明、清代史料笔记丛刊等。

其中尤为值得重视的是《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和《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它们都具有工程浩巨、内容丰富全面、编纂体例严谨、学术价值很高的特点。《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由中国史学会组织、部署,始于1951年。各个专题由范文澜、翦伯赞、邵循正、齐思和、向达、白寿彝等著名学者任主编。十年之中编辑、出版《丛刊》10种,包括《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洋务运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和《辛亥革命》,共62册,3000余万字,规模如此巨大,而且是连续出书,持续不断,令人赞叹。

《丛刊》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近代史资料的一项大规模的科学整理,涵盖了近代史的各个重要时期,提供了最有价值的研究资料,堪称是新中国历史科学的一项盛举。各个专题的文献整理工作均体现出高度的科学性,不仅体现出学风严谨的精神,而且处处包含着如何将整理成果最适宜地提供给研究者所用的设想,其科学、严谨的工作程序为:(1)尽可能地广泛搜集史料;(2)精心地选录和合理地分类、编排;(3)分段、标点、校勘;(4)撰写书目解题,编制与本专题相关的各种附录。这些工作中无论其中的某一项,工作量都是很浩巨的。仅以分段标点和校正错字而论,全书3000余万字的史料都经编选者认真加工、提供定本,让广大读者方便地阅读、使用,即此一项就是难度很大、而又功德无量的工作。专家们所搜集的材料极为广泛、全面,有许多是希见的文献甚至是秘藏的史料,而更大量的是分散难找的,现在都经过整理集中展现在读者面前,同时,专家们又以远大眼光,广泛搜集了各个时期有关边疆地区和少数民族史料,并在当时条件下,尽可能地搜集、翻译外国史料,体现中国史与世界史的联系。所有这些都保证了这套《丛刊》的高度学术价值。试以翦伯赞主编的《戊戌变法》为例,主编对其选录资料的范围有科学的设想:“它应该提供戊戌变法运动发展的全过程的重要资料,包括它发展的时代背景,百日维新的具体过程和内容以及它对后世的影响。”^①根据此项高明的史识,本书首先对自19世纪60至90年代数十年间大量分散的早期维新派的论著,如冯桂芬、郑观应、王韬、邵作舟、陈虬、陈炽等人的论著,作了筛选、整理和辑录。编者更突出百日维新运动的经过和内容、戊戌维新的政治纲领和政治意图这一主题,选录了包括记述戊戌变法始末的专著,当时人的论著、墨迹、遗稿、笔记、杂录,当事人的日记、上谕和奏议等大量文献。编者从大量官私记载中,选录了上谕316条,奏议109篇。有康有为七次上书、奏议29件,有陶模、胡燏芬、李瑞藻、容闳、徐致靖、陈宝箴等维新派人物及其支持重要奏议35件,总理衙门、吏部、兵部及孙家鼐等奏议25件,荣禄、张之洞等奏议20件,各方面人物书信共122篇。所选录和整理的文献中,还有不少为以往未被研究者注意或是首次公开发表,如康有为的

一批未刊稿,系康氏后人首次提供,翁同龢、叶昌炽、袁世凯等人的日记,都是第一次整理和公开出版的。本书第四册选录的《康有为自编年谱》,以往印行过的版本错讹甚多,研究者殊感不满意,本书编者经过认真校勘,改正了大量错误,因而是为研究者提供的第一个定本。10个专题的《丛刊》的编纂完成,又生动地体现出学者们的奉献精神 and 各方面人士的无私帮助。负责各专题主编的学者,其中如范文澜、邵循正、聂崇岐等位,本身是近代史专家,而像翦伯赞、向达、齐思和、柴德赓等位,原先的学术领域为古代史或外国史,但为了发展历史科学的需要,却毅然不顾,全力以赴地投入近代史领域的学术工作。发扬这种高度认真负责的精神,是医治近年来学术界浮躁风气的良药。当时,如郑振铎、张元济、向达、叶恭绰、康同壁、钱基博、章士钊等位人士,都为《丛刊》无私地献出私人珍藏的史料,这同样体现出新中国初年全国人民热情奋发为推进各项事业前进的崇高精神和时代风尚。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的编纂工作始于1953年,包括了多种专题,有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近代工业史、近代农业史、近代手工业史、近代对外贸易史、近代铁路史、近代航运史资料等分别出版,有的部头太大而分为两册,总字数近1000万字。近代经济史的资料一向分散,此为第一次大规模的系统整理,担任各书主编的学者,有严中平、汪敬虞、孙毓棠、彭泽益、李文治、章有义、姚贤镐、宓汝成、聂宝璋等位,由于他们深入、艰苦、细致的工作,换来了高学术质量的成果,各书不仅内容丰富、全面,选录了大量少见的有价值史料,编纂体例严谨,标点正确,校对认真,而且所提炼的是带有研究性的成果,对于推进近代经济史各个领域的研究意义极大。如李文治、章有义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共220万字,195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就充分体现出其系统性,和兼具专题性与区域性的特色,取材极为广泛,所分列的专题均为恰当地归纳、提炼出1840~1937年中国农业发展的重要方面,既提供了丰富的史料,又对研究者提示了有价值的研究范围或研究课题。^①因此,毫不夸张地说,这部书对于研究中国近代农业和农村经济具有极重要的参考价值。当时,担任中国科

^①如第一辑中概括、提炼的专题之中有:鸦片战前的土地关系和农民生活;战后的土地关系和地租剥削;外国入侵后的农产品的商品化以及商业资本的活跃和高利贷剥削的加剧等。第二辑中有:辛亥革命至1927年的农村土地关系、农业及农村的进一步商品化;外国资本、城市资本和高利贷资本在农村的活动等。第三辑中有:1927~1937年农村中的封建和半封建剥削;世界经济危机对中国农村经济的影响;日本对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农村奴役等。均说明编纂者发掘资料之深入和观察问题眼光之敏锐,对于研究者极具启发性。

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和经济史组组长的严中平为组织和指导《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做了大量出色的工作,撰写了多篇文章,对于全书各册高质量完成编纂任务起到重要作用。

五、学科建设取得显著进展

新中国成立后,历史科学受到国家和社会各方面的重视,改变了旧中国历史学科体系不全、力量薄弱的状况。“十七年”中,各综合大学和师范学院均全面普遍设立了历史学系,开设大量课程,逐步形成了基本完整的学科体系。在近代史、世界史学科表现尤为突出,解放前仅有少量学者从事这两个领域的研究和教学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则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在中国科学院之下专门设立了近代史研究所和世界历史研究所,研究成果也甚为显著。再如,民族史研究也得到充分重视,有关部门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状况和民族史调查,获得了两亿字以上的调查资料,为此后进一步研究打下良好的基础。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中,培养人材也取得显著成绩,许多当年的青年学者和大学生,以后都成长为历史科学研究和教学的骨干。譬如,50年代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中国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参加《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撰写的“诸青”(为张岂之、李学勤、杨超、林英、何兆武五人的笔名),由侯外庐带领和培养。据侯外庐《韧的追求》中记述:这几位青年同志均1953年以后进所,1955年撰写工作启动时,他们都在30岁上下。“他们有理想,文史功底比较厚,三、四年时间,表现出异常的勤奋、学风朴实的共同特点,并各有所长。”侯外庐向他们布置任务,“压担子”。首先,向他们讲述撰写要求、研究思路、主要论点和基本结构,然后经常地与他们一起讨论、指导,俟交出有关章节的初稿后,侯外庐又为之加工修改和提高,有时往复多次,而最后成稿。在全卷27中,由“诸青”执笔的有13章,如隋唐佛学、韩愈、张载、二程、朱熹、王阳明等。“所以,事实上在第四卷中,他们唱了重

头戏。”侯外庐又说:“我常常在他们对我的修改意见的反修改中,体会到他们可贵的独立思考精神,了解到他们坚持的意见所在。同时,我自己的每篇文章也都请他们修改。我常常在他们严肃而颇不拘束的修改文字中,认识他们的成熟程度,看到他们才华的增长,发现他们思想中闪烁的光点。”除杨超过早去世外,“诸青”中其他几位,以后都成为独当一面的知名学者。(详见《韧的追求》第三章第五节“‘诸青’的贡献”)由此可见“十七年”培养科研骨干人才而推进学科建设之一斑。

参考文献:

- [1] 学术动态报道.展望新世纪中国史学发展趋势[N].光明日报(史学版),2001-10-02.
- [2] 刘大年.太平天国史·序[M]//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1册.北京:中华书局,1991.
- [3] 侯外庐.韧的追求[M].北京:三联书店,1985.
- [4] 安作璋.求实求真,老而弥笃[C]//庆祝杨向奎先生教研六十年论文集.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 [5]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绪言(修订本):第一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3.
- [6] 漆侠.正确认识历史上的封建统治阶级和封建王朝[J].新建设,1953(7).
- [7] 嵇文甫.关于历史评价及其他[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57:3.
- [8] 翦伯赞.应该替曹操恢复名誉——从《赤壁之战》说到曹操[N].光明日报,1959-02-19.
- [9] 吴晗.论历史人物评价[M]//吴晗史学论著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400-408.
- [10] 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二编[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 [11] 刘大年.论康熙[J].历史研究,1961(3).
- [12] 戴逸.刘大年同志与中国历史研究[J].近代史研究,1995(5).
- [13] 中国史学会.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戊戌变法》(一)[M].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2.

(责任编辑 何晓莉)

Abstract Analyzing and summing up earnestly achievements in historiography of 17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RC is of significance not only for how to understand correctly the development road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 and clarify the people's serious misunderstanding but also for how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direction of Chinese historiography. This paper tries to sum up these achievements from four aspects: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 in general history, dynastic history and specific history; the progress in understanding correctly major historical issues; the great achievement in compiling and publishing large historical documents; the remarkable progress in discipline construction.

Key words the achievement in historiography of 17 year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RC; regard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s guidelines; a fine study style of 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the development road of Chinese contemporary historiography